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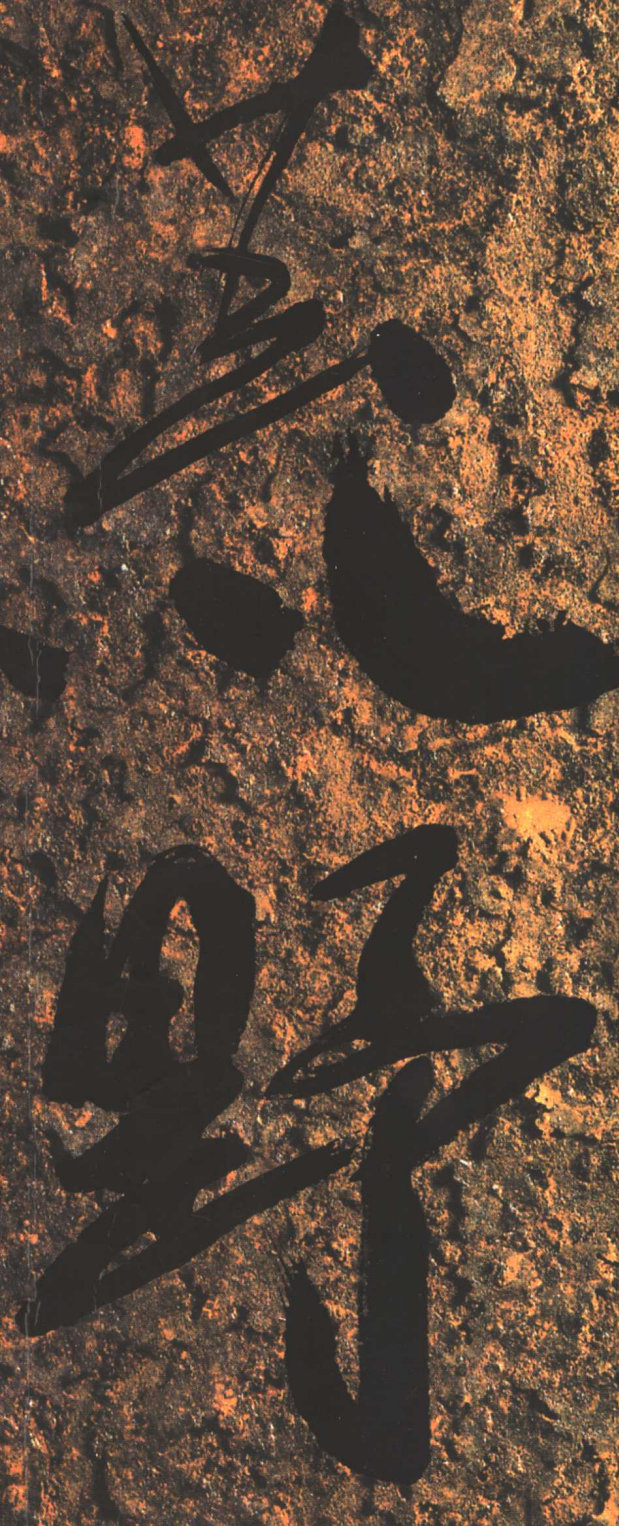
郑九蝉 著

郑九蝉文集 第三卷

花城出版社

荒野

上



郑九蝉文集

第三卷

荒野

上

郑九蝉 著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
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郑九蝉文集 . 第 3 卷, 荒野 . 上 / 郑九蝉著 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0. 12

ISBN 7-5360-3302-8

I. 郑 ... II. 郑 ... III. ①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0946 号

郑九蝉文集

(第 3 卷)

荒野 (上)

郑九蝉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

(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75 印张 2 插页 290,000 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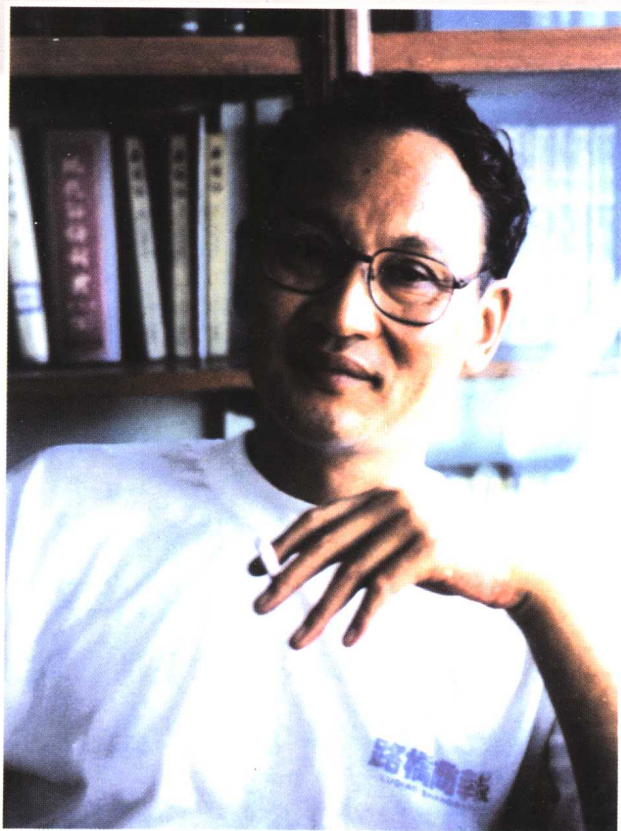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,000 册

ISBN 7-5360-3302-8/I·2745

(共 12 卷) 定价: 368 元 (本卷定价: 28 元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作者像

1949年生，祖籍浙江台州黄岩区上郑乡。

1969年，下乡插队黑龙江省绥滨县。

1977年，就读佳木斯师范学校。

1984年，调回浙江黄岩县委宣传部工作。

1985年，就读鲁迅文学院。

1987年，回黄岩市委宣传部工作。

1994年，调回浙江路桥工作至今。

著有作品多部，共约400多万字，其中《能媳妇》等六部中短篇小说，获国家级、省部级大奖；《黑雪》与《浑河》两部长篇小说分别获全国金钥匙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大奖。

荒野

谨将此书献于养育我成长的北
大荒

——题记

一、驮地

民生村是个小村子。距黑龙江80里，距松花江20里。它坐落在绥化县的正北面，挨着村，有一条很直很直的大官道。这条道不是人工修的，而是由鞋底、由车轱辘、由马狗和犁的两旁压成，年长日久，自然趟出来的。11月了，下过封地雨了，水也冻了，地也冻了，树也

作者手迹

序

肖建国

郑九蝉和我是鲁院时候的同学。我读七期，他八期。鲁院的前身是中国文学讲习所，新中国建国之初就开办了，断断续续，历三十余年，却只办了六期。到了我们那期毕业时，才改名为鲁迅文学院。我们第七期的学习时间是1982年至1984年，郑九蝉所在的第八期是1984年至1986年。在第八期学员将要毕业的这年夏天，忽然传来消息，经国家教委批准，北京大学拟开设作家班，首届作家班的学员，主要以我们这两届鲁院毕业生中招收。这自然是“中国作协”和驻北京同学多方努力的结果，这消息使我们十分兴奋。那年我正在一个县里挂职担任副县长，接到通知，我立即选择了读书，辞去职务，和湖南的同学结伴到了北京。我是在到达的当天晚上，第一次见到郑九蝉的。他到我们房间来串门，听说了我的情况后，忽然冒出一句：“都当到副县长了，还来读什么书。”我觉得这话有点不顺耳，但毕竟是初识，却也没有在意。

我们在鲁院安顿下来，找来一大堆复习资料，准备考试。我们都很紧张，也很放松。上午复习功课，下午互相串门聊天，然后便联系周围的单位比赛篮球，比赛乒乓球，天天晚上还操办舞会。郑九蝉当时正在修改一部长篇小说，全然没有心思复习功课，每天关在房里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他改稿改得十分艰苦，每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，脸呈菜色。他偶尔也

出来串串门。他对我们湖南籍的同学有着天生的好感，常常来找我们聊天。他总是一副乐爽爽的样子，直言快语，高声大嗓，哈哈连天，很难设想他是曾经经历过太多艰难坎坷的老知识青年。郑九蝉对体育对跳舞都无缘，但他是我们球队最忠实的观众。每次打比赛，他都会到场，抱着我们换下来的衣服，站在篮球架下瞪着眼睛看。看到兴奋时，常常会不顾一切地大呼小叫，旁若无人，至情至性，无遮无拦。听着那不断发出的欢叫声，你会感觉到，跟这样的人交朋友，是完全可以无遮无掩、坦露心扉的。

考完试，我们接到录取通知书再次在鲁院相聚时，个个都无比地兴奋，都更加才华熠熠，谈吐高阔，挥斥方遒。有一小段时间，每天做的就是：聊天、喝酒、打球。郑九蝉似乎仍然在修改他的长篇，仍然改得很苦。他住的房间的门，永远是关着的。他每天最后一个出现在饭堂时，脸都是青的，眼睛里网满血丝。

忽然有一天晚上，已经很晚了，我们都准备睡觉了，郑九蝉推门进来，乐呵呵地伸直了手跟我们一一握过，说：“老肖，再见了！”我奇怪地问：“怎么，不读了？”他说：“不读了，回去了！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不为什么。不想读了！”我看他一脸正经，不像是开玩笑，也不像是赌气。我知道他的性格，认定了的事情，就会坚决照自己的意志去做的。我没有劝说，默默跳下床，送他回到房间。

第二天早上起床跑步时，就听说郑九蝉已经走了，搭早班车回去了。我还听说，他走之前，在下面饭堂的拐角处还做了个小小的仪式。我突然就心里格登一跳，觉得九蝉这个人还很神秘的，后悔没有跟他多聊聊。

一别十三年。

去年底，郑九蝉忽然到广州来了。他带了一支文化人组成的小队伍，到广东来学习办报纸的经验，顺便也看看广州的朋友。他仍然是精神焕发，直言快语，高声大噪，一见面就又叫又叫又拥抱，用他强烈的热情感染别人。但岁月的磨蚀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：腰背微驼，眼袋呈青紫色，下巴上都有皱纹了。

这次广州之行，九蝉还跟出版社谈妥了一件事情：出版他的文集，十二卷，近四百万字。

这个数字让我吓一跳。

我有点怀疑：他写了有这么多东西么？

郑九蝉的书稿很快就寄到了，在责任编辑的办公桌上堆成了一大堆。他的作品就像他这个人一样，很扎实很“堆伙”地矗放在那里，证实着他的力量和存在。

九蝉的作品主要是两部分：小说和散文随笔。九蝉是在苦难中打过几次滚、死过几次的人，他的体魄，他的心脏，他的思维神经，都已经被苦难的汁水浸泡得格外坚强、硬实。他在写小说的时候，也仍然沉浸在过去苦难岁月的情绪中，所以下笔特别钝重。他就像一个负重在大海中游泳的人，一摆臂，一蹬腿，甚至一声喘息，都特别用力，特别沉重。他的小说作品中，积郁着一种浓重得化解不开的苦难感。他的作品最能打动我的地方，就是这种苦难感。我总认为，一部小说，尤其是长篇小说，苦难感是应该具有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

九蝉的小说沉郁厚实，苍凉悲壮，他的散文随笔则是尖锐的，锋芒毕露的。

这跟他的身份有关。

九蝉现在的身份是路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商报总编。在这个位置上的人，必然接触面广，视野开阔。且九蝉生性豪爽

大度，喜欢广交朋友，广结善缘，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出，他的朋友是真多：市委书记、市长、部长、局长、科长、办事员，企业家、金融家、投资者、家电产品推销员，作家、艺术家、记者、街头流浪艺人，工人，农民，家庭妇女，修鞋的，拾破烂的，以及看相算命推八卦的……几乎遍布了社会的各个方面。作家有两种：一种是书斋型的。这种作家以在书房里读书写作为主，偶尔参与一些社会活动。另一种作家是社会活动型的，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社会活动，通过丰富的阅历积累经验（读社会的这本大书），不断激发写作的灵感。九蝉当属后一种类型的作家。九蝉在宣传部副部长、报社总编的这个位置上，真是如鱼得水、进退自如，既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，得到大量的写作素材，又可以有自由的写作时间，随时表达自己的见解。应该说，九蝉是很了解自己，也很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。（想起九蝉跟我见面伊始说的那句话：“都当到副县长了，还来读什么书。”这确是一种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的肺腑之言。）

九蝉的散文随笔内容，主要在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范畴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，也是历代文人议论最多的话题。九蝉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作家，同时也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民政府基层干部。他在基层工作、生活中，切切实实地感受到，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，新旧体制交替，中西文化碰撞，大变革，大动荡，社会在大踏步地前进，但伴随而来的，也出现了诸如社会腐败、道德沦丧、人性趋恶等等弊端。九蝉从心里面欢呼社会的进步，也从心里面痛恶亲见亲闻的种种弊端。作为一个人的良知、一个作家的良知、一个政府基层干部的良知，九蝉绝不会沉默。他当然要把自己的感受都写出来。九蝉是写小说的。按照通常的艺术规律，小说需要沉淀，需要精巧周到的构思，用的是曲笔，讲究的是含蓄。九

蝉暂时摒弃了小说这个武器，改写随笔。看得出，九蝉在写作这类随笔文章时，感情是激扬慷慨的，处处流露出他的至情至性。以我在基层工作的经验，官场是最消磨人的个性的，尤其长期担任副职的人，很少有不变得圆滑世故。九蝉的为人、为文，却还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真性情。

这很难得！

九蝉是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中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，由知青，而工人，而县委宣传部通讯报道组成员，而文联主席，而宣传部副部长，而报社总编，路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来了。他经历过的一些艰难困苦，是一般人所没有经历过的。他把这些艰难困苦深藏在心里，脸上永远是乐呵呵的，精神抖擞，工作，读书，写作，一路前行。

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——

“生命的力量，既伟大又可怕。——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荒农村插队的时候就理解到了的。有这么一天，我和乡亲们一起种地，种完了地之后，我看到了道边放有一块生了锈的旧铁板。我出于一种孩提式的好奇，把这一块沉重的铁板揭将起来，把剩余下来的豆种全部倾倒在铁板底下。六七天之后，我又经过这里，我看到了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奇迹：那一块生了锈的铁板，竟凭空被抬了起来——离开地面足有一寸多高。这是什么东西在那里作祟呢？我揭起了那块覆着的铁板一看，瞠目愕然了：我倾倒在铁板下的豆种全都发了芽了，小小的黄豆芽竟齐崭崭地把这块铁板顶了起来。从那一天起，我突然间明白了：杰克·伦敦的《渴望生命》，为什么会受列宁欢迎的道理了。因为他歌颂了人生的极致。我也突然间明白了，孙子兵法中为什么要强调‘致死地而后生’，真正的艺术家、思想家，为什么要害怕困难和厄运呢？”

现在，郑九蝉通过近二十年的努力，把自己的文集奉献在了读者面前，用十二本砖头一样厚的作品，将生命的“铁板”顶了起来，这比他歌颂过的黄豆芽更伟大，更硬扎！

我为他高兴！

谨将此书献于养育我成长的北大荒

——题记

叙 地

民生村是个小村子。距离黑龙江 80 里，距离松花江 20 里，它坐落在绥化县的县的正北面。擦着村，有一条很直很直的大官道。这条道不是人工修的，而是由鞋底、由车轮子、由马狗爬犁的两条底板，年长日久，自然趟出来的。11 月了，下过封地雨了，水也冻了，地也冻了，树也冻了，那道自然也好走得多了。那车那人那马在这条道上，从早到晚地川流不息。5 月初春了，水也活了，树也活了，地也活了，这道自然也就活了。渐渐地不好走，行人也显得少了。北大荒的土地和南方的土地不一样。南方的土地存不住水，北大荒的土地存得住水。雨季一到，民生村四周的田野里，一圈又一圈，一洼又一洼，白亮亮、光闪闪的尽是水。那水漫了苞米地，漫了高粱地，漫了西粘谷地。那些在水里的庄稼被水泡得有点挺不住架，能站得住的咬着牙强站着；实在支撑不住的，叫风轻轻地一吹，便趴倒在水里了。那江里的大鱼，顺着沟蹿进来，显得很莽撞。撞在苞米秆子上，苞米秆子哆嗦了一下；撞在高粱秆子上，高粱秆子一阵乱晃，每每到了这时候，民生屯里的人，便拿着铁叉子、鱼罩子出来了，有的穿着单衣单裤；有的只穿着小上衣，脱了裤子（那脱下来的裤子，必然叉开腿搭在自己肩膀上），去扎鱼。被罩叉着的鱼就在鱼罩子里，叉尖子上，拼命地挣扎。有的还会发出绝望的咕咕叫。它们抡起来的大尾巴，会把水甩得“哗咕哗咕”地响。在挣扎中，在水的“哗凌”中，还会冒出来引人一阵又一阵地欢笑。在那欢笑声中，人们也就把蒙在心头的暗影慢慢地消除了。

在这种季节里，你会看到这条黑色的大道，像蛇似的在那

里蜿蜒与游荡。一会儿它把头抬起来，一会儿它又低下脖颈去，一直潜游到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去。为了通人——那车啦、爬犁啦、牲口啦，民生村的人便推出几条小船，搁在那被水断了的道路处。放了几个好水性的船夫。那边有人叫唤过渡了，船夫便把小船哗啦啦，哗啦啦摇过去；这边又有人喊过渡了，那勤劳的船夫再把小船哗啦啦，哗啦啦地摇过来。

这条路是官路。

这条船也是官船。来来往往的人根本用不着花钱。

船夫大多都是民生屯人。他们拿民生屯的钱粮（后来是工分）过日子。况且熟悉与不熟悉的，男的与女的，聚在同一条船上，也有许多兴味。船儿一开了，他们便可以打开话匣子了。论的内容自然十分复杂。胡扯八咧，想什么就去扯什么。可以从天上的“皇母娘娘”讲到“凡夫俗子”，也可以从“大姑娘偷养私孩子”讲到“王金定寨前招亲”；既可以从“马寡妇开店”接五客讲到人人垂涎的“十八摸”；也可以肆无忌惮地评价各国的领导人。碰得巧了，那些在水里弄景的鱼儿——大概它也被人间那种特有的味道深深地吸引住了吧——受不了这种令人心醉的诱惑，“哗啷”一声响，扭着白亮亮的身子跃了上来，正好落在这小小的船舱里。于是，给这坐船的人，带来更多的欢乐。人们一下子便起哄了，争先恐后伸手去捕捉鱼（如果有好看的娘们在，那些淘气的汉子们必然趁机要在她们的卡巴裆间的凹洼处掏几下）。鱼在笑，满船的人也在笑。有时候闹得邪乎一点了，那小小一叶扁舟，就会给蹬翻了，坐船的人，一下子变成了大年三十的冰饺子，“扑通”、“扑通”往水里掉。

这种翻船的事，这里每年都要闹几次，当然没有淹死过人（也不可能淹死人）。一、这里并非正是流儿，一般都很

浅；二、这里的船夫，也都是水里的高手，属“浪里白条”的，在“浪里白条”手下淹死人，这还得了！

这条大官道，顶顶讨厌的是四五月里开春——大地返浆的时候。地上面由于节气到来，而早早地化开；二尺深底下，那地却依旧是硬邦邦的铁板一块（北大荒的树根之所以火车盘似的盘在地表上深不下去，大概就是这种原因吧）。雨水一大，便渗不开。大田里泡得一片鼓鼓囊囊的。那大官道自然走不得人，走不得车了。可是到了要紧的时候——比如拉种子，比如送病人——必须走的，只有走。往往车老板一不小心，车轮子打个偏，就会被“大酱缸”陷住。这一陷，那可就倒了大霉了。整个大车胶都会沉在这粘粘稠稠、臭气熏天的泥浆里。那马在“酱缸”里滚得浑身都是泥巴，累得“呼哧呼哧”地直喷粗气。实在挣扎不出来了，只有倒下去。泥巴一没上它的脖子了，那牲口儿也就可怜了，两只白棱棱的眼往上翻着，直荧荧地瞅着人，仿佛在不住声悲乎乎地苦求：人哪人哪，可怜可怜我救救我吧，我为了吃这一口草料，给你们出了那么大的力，你们还那么揍我……民生村的人讲仁义、讲慷慨、讲大方、讲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他们用不着车老板喊——这里人管马车夫，叫大车老板——一看到那车轴子扎下去了，车尾巴翘起来了，大鞭小鞭炸百子炮了，他们就知道这里出事了。他不论手里干有什么样的活：或点籽或踩格或铲“孟生”的，都乱纷纷地跑来帮忙了。人多力量大，柴多火焰高，填车胶的填车胶，摘挂的摘挂，一阵“呼咳”，一阵“吭唷”，把马车抬出来了。那抬出来的马，模样儿实在够寒碜的了。没一点儿囊劲，空空地支撑着，如两根拨动着了的琴弦在那里直哆嗦。

也有牲口被这“大酱缸”活活淹死的。然而不多，但，每年总得有几匹。近边的屯子，把淹死的马放在别一挂车子上，

由别的活马“吭哧吭哧”拉回去。远地的（像距离民生屯70多里的联合屯）那马就拉不回去了，便扔给民生屯的人去吃，民生屯人就吃。他们不管，扒了皮照样。该烩的，就加上八角大料烩；该剁碎了包饺子的也就剁碎了包饺子。每每死了一匹什么牲口，民生屯高兴得像过什么节一样。家家的小烟囱上紫霭色的烟儿“咕噜”、“咕噜”地冒个不住，冒得多了，就像一块老布，慢慢地铺排开去，然后，帘子似的垂下来。香气从家的小灶间里咕噜咕噜地往外冒。灯一上亮，家家就打牙祭。男人们操起小酒盅，张开大嘴，火辣辣地喝酒；女人们先伸出两只小手，捉起那两头翘的小饺子来，塞进嘴里，嚼上一口，歪着头细细地品味了一下，然后咧开嘴，大声大声地说：喔，那味道还是满不错的呢！

谁都忘记了这是一匹死牲口。

自满洲国起，就有这个屯子；自有这个屯子，便有这条路。

这条路可不是一条平平凡凡的路，而是本绥水县的一条大动脉。好多好多新鲜的血液都是从这条大动脉里一拱一拱输进去的：苏联红军进东三省打小日本，是从这条路进来的；解放军解放大东北是从这条路进来的；近些年三五九旅的旅长王震带了百万官兵“屯垦戍边”，也是从这条路进来的。

这条路可谓“功勋昭著”矣。

解放前，此屯的村长向当地政府吵着要修这条路；

解放后，新中国的此屯村长向当地政府吵着要修这条路。

吵吵管你吵吵，政府还是政府。政府是有老猪腰子的，他们对下面的叫唤，可以听可以不去听。

这条路还是这条路：过去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。

直到1973年5月初春到9月里挂锄的时候，县政府里的

官员，这才调动全县的劳动力——那可是不花钱的——齐下虎龙关，把这条路修起来，据“路透社”的消息说，此条路的修成功，完全仰仗于一位中央高级首长的光临。那时，中苏边界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磨擦。那位中央首长——“路透社”不曾公布此首长的真实姓名——坐着小卧车（“路透社”指明说那是越野车）专程赶到80里外的303哨防站去处理一件急事。这位高级首长不走时运，正赶上这条大官道返浆，坎坎坷坷特别难走。那位大首长从来也不曾到过这里，误以为这里也和既平又坦、荧荧华灯初上的长安街差不多。他坐在首长座上，不住地催司机快开、快开。那司机知道此条路是个“女痞子”，不能磨粘，弄不好，一粘就会浑身是泡。可是“身在官场不由己”——谁叫他是吃这一碗饭的呢——于是快开。舵子略打一点儿偏，一下子滑进了那会装假呈相的“大酱缸”里。那“大酱缸”离民生屯不远。司机一咋呼，民生屯的人便咋咋呼呼捋捋纷纷地来了。他们很勇敢，硬是用肉做的肩膀把此辆铁铸的车扛起来。面对着这种红火的情景，此位中央首长十分感激，问：这条路为什么会成这种样子？那时民生屯的村长叫杜春永，是条汉子，会见缝下蛆，趁机煽风点火，告了当地县政府老娘一刁状，说县里的这一帮官老爷们是没梁的水桶——饭桶，白吃饱。一来，由于这条道误了他的“军用时间”（中央首长语）；二来，这条道也的确缺德，愣是往这位中央首长身上抹了一层黑乎乎粘粘稠稠的泥巴，折腾得他活似一只猴；他自然气不打一处来。办完了事，泥车驾到县政府招待所。一个电话，便把绥水县一应大小的官员们统统地揽到他的面前来。叫他们看两样东西：一是那一件泥古千秋的呢军服，二是由于他的晚到苏方提出来的抗议照会。他“呸”地啐了县长们一口，那伸出来的手指头像敲木鱼儿般地戳在他们的鼻子尖上：